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

2011 年度报告

Annual Report



2011“中国下一站”年会现场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院长、“依法治国”理念倡导者李步云教授致辞
时间：2011 年 1 月
地点：上海淳大万丽酒店



“君子有道”健康、艺术与公益慈善晚宴
时间：2011 年 4 月
地点：上海淳大万丽酒店

目　　录

2　院长寄语

3　学术委员会

4　年会

10　论坛沙龙

12　《加图决策者手册》

14　刊物

16　声音

22　财务报告

院长寄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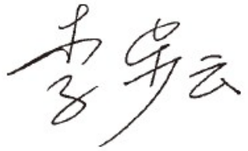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成立，受惠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正是社会财富的迅猛增长，才使一家纯粹民间出资成立的研究机构成为可能。

自近代开埠以来，上海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镇。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有幸根植于这一国际性大都市，关注转型中国的各种问题，以跨学科的视角、独立的身份为中国公共事务提供洞见。

自 2002 年成立以来，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今后，我们将继续保持并发展同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企业界的紧密沟通，与国际社会的广泛联系，积极开展同各国研究咨询机构的交流与合作，用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政府和社会服务。

谨向国内外所有关心和支持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工作的机构和人士致意。



学术委员会

吴晓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陈志武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

曹远征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李步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张新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上海分行行长

沈国明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顾长浩
上海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副主任

李维森
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

季卫东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

张春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院长

高全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志铭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年会

未来中国的发展道路取决于政治家的胆识，法治工作者的职业操守，法学家的勇气和人民群众的觉醒与抗争。金融与法律两个领域在当代中国不容分割。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院长李步云教授

中国正处在剧烈的经济与社会变革中。经济增长的速度非常快，但崛起后的中国面临的问题还很多。在 2011 的开始讨论这些中国的下一步要怎么走，是很有意义的。
——《经济观察报》研究院院长新望

在过去的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里，中国保持年 GDP 增长率近 10%，并且 凭借耀眼的经济增长速度，博得了全世界的关注。但与此同时，中国式增长面临着诸多指责——区域经济平衡、居民收入差距、城市化与工业化过程中的利益分配、经济增长的环保成本等议题逐渐成为政策博弈的重心，转型过程中的利益纠葛日趋激烈。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必须改变！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第五届年会——“中国下一站：机遇与选择”于 2011 年 1 月在上海举行。本届年会，研究院携手北京市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经济观察报》共同主办，现场共有来自 60 余家机构的海内外 400 余位学术精英，就中国现阶段的内忧外患防微杜渐，共谋出路。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院长、著名法学家李步云教授与《经济观察报》研究院院长新望分别为本届年会致辞。





本届年会关注：

- “中国下一站：现实、选择与未来”
- “世界经济复苏与中国经济走势”
- “法律职业与中国制度转型”
- “‘十二五’展望与中国城市化进程”
- “深化金融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
- “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机制”
- “制度转型、社会危机与公共治理”
- “关注当下：我们面临的挑战”

“中国下一站：机遇与选择”参会嘉宾（部分）

曹远征：中国银行首席经经济学家

吴晓灵：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彭文生：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顾长浩：上海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副主任

韩　磊：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

李　权：苏格兰皇家银行中国区执行总裁

马国南：国际清算银行高级经济学家

斯伟江：大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王志浩：渣打银行中国研究部主管

魏本华：“东盟+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负责人

殷剑峰：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袁裕来：浙江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

张力奋：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FT 中文网总编辑

戴志康：证大集团董事长

Albert Keidel：大西洋理事会亚洲项目的资深研究员

张仁良：香港浸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铜紫荆星章太平绅士

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周子衡：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

房四海：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新　望：《经济观察报》研究院院长

武小欣：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

夏纪军：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温永鹏：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中心研究员

储幼阳：上海金融学会理事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张曙光 先生

“中国当今的现实状况可以被描述为：
‘强政府、富中央、穷百姓’，国强而民不富”

在“中国下一站：现实、选择与未来”阶段，来自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的张曙光教授就“国富民不强”的现象做主旨演讲。他在报告中通过 94 年分税制改革前后中国收入分配的对比，生动地阐述了中国政府收入与百姓收入的替代关系，并呼吁要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和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增加居民的财产收入。

同时，张曙光教授在会上提出了诸多重要的政策性建议，例如：在打破国有部门垄断的基础上，应当先收租再分利，收租与减税同行，以此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在“关注当下：我们面临的挑战”阶段，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女士在晚宴中发言，主要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表了自己的想法。

第一，中国的价格体系必须有利于资源的节约。只有捋顺资源价格，才能让国人切实意识到资源是昂贵的，才能不通过消耗过度资源的方式来增长 GDP，才是对中国未来负责。不能因为现在有了通胀，就放缓对资源价格调整的步伐。第二，中国要控制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使价格真正成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信号，要让每个个人对自己的财产和行为的效率负责任。第三，提高生产力首先要降低交易成本，而在目前中国，主要是要通过约束公权力来降低制度成本。只有把以上三点做好，才能突破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瓶颈。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吴晓灵 女士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突破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PartⅠ：中国下一站：现实、选择

在“十一五”过渡到“十二五”的关键时期，中国面临重大选择，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问题——中国面临着城乡之间的矛盾、东部和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收入之间巨大差异的问题，未来维持中国经济能够较快的发展速度说面临的资源如何解决的问题，环境、气候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曹远征就《在平衡下的世界经济》的主旨发言中，对中国的“十二五”规划，提出了中国在未来 5 年中经济发展着力要沿走的路线。他认为，国有企业必须提高分工，中国需要不断尝试探索贸易顺差与 GDP 相挂钩的新规则。另外，中国需要在未来努力捍卫 WTO 各项规则的权威性和完整性。



伴随着产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进程，中国已步入风险社会，且面临着应对社会细节变化的治理方式的选择。一是加强行政治理，二是司法部门提出立法进行调解，三是提高公共决策的参与权。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季卫东教授在《风险社会中的法律与公共政策》中强调了把不同利益诉求和问题纳入公共决策的重要性。



时任“东盟+3 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主任 的魏本华先生在总结主旨发言时表示，他对未来 20 年中国的 GDP 增长是非常乐观的，但中国也需要处理好季卫东所谈到的一些社会风险，同时中国的人均劳动生产力还很低，因此还有很多需要努力。

PartⅡ：世界经济复苏与中国经济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遇到一系列阻力，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美两国正遭遇诸多利益博弈，于此同时，各国经济与贸易政策的频繁冲突也引起了国内外的激烈讨论。就中国国内而言，短期内控通胀与保增长造成了中国经济政策的两年格局，中长期内，中国依然需要考虑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之变。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周子衡则从历史的视角寻觅了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向，对比了毛泽东时代的实物经济 30 年与最近的 30 年的发展路径。周子衡认为，中国廉价竞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个“贵”的时代已经悄然来临。要实现这一突破，中国还要多修货币和法律这两门课，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利率，汇率问题上做文章。



香港浸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张仁亮教授在主旨发言中呼吁中国要更多地看到未来可能面临的危机，而不是坐享高增长所带来的成果；现在中国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如何分配经济增长的成果。

PartⅢ：法律职业与中国制度转型

在中国转型的过程中，律师作为一种职业在中国当前的特殊意义。法律职业在中国面临着腐败、司法不独立等诸多挑战，未来发展方向令人堪忧。司法制度在中国制度转型中需要重新定位其角色和影响力。



浙江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袁裕来律师以《律师的职业风险控制》为题，在 2010 年 12 月 29 日北京盛廷律师事务所三位律师“镇江代理拆迁案被殴打事件”的案例中，指出，尤其是代理重大敏感案件，律师应学会规避风险。律师首先得保护自己，才能保护当事人。

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陈有西教授在《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司法保护》的讲演中，提及 2010 年中国法治给他感受最深的两点：其一是法治倒退，其二是意识形态的控制。他特别指出，中国的民营企业整体面临着不乐观的环境，法律应更好地维护民营企业的成长环境，消除歧视，更不能把它们视为黑社会的基础。最后，他还提到中国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强势政府和弱势法院。



PartⅣ：“十二五”展望与中国城市化进程

“十二五”规划带给中国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在 30 年的高增长之后，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公共政策时代，要考虑更多我们的资源要如何去用的问题。城市化进程作为中国增长动力在未来面临诸多挑战，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职能需要得到有效转型。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陆铭为大家演绎了中国城乡经济发展的逻辑，认为农民工进城压低了城镇劳动工资，增加了企业利润，利润转化为储蓄之后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于是造成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快于工资增长速度，其结果就是消费（以劳动收入为主要来源）跟不上供给的步伐。这样的发展模式带来了一系列特殊的宏观经济现象，例如工业部门投资非常高，企业储蓄率持续上升等。另外，陆铭教授还为大家介绍了他正在进行的户籍制度的研究，认为中国的户籍制度制约了消费的增长。最后，陆铭教授批判了粗糙的刘易斯拐点论，认为有很多因素都可以更好地解释中国劳动力工资的上涨，例如投资上涨，持续的惠农政策，以及农民工维权意识的提高等。

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FT 中文网总编张力奋主持该平行论坛的讨论。

他在总结时表示，五位嘉宾的发言分别从实证，制度和社会现状等角度做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中国进入了一个公共政策选择的时代，而其中城市化的质量将是大家共同关注的公共政策问题。



PartV：深化金融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

当前中国国内、国际经济政策处于两难中，汇率政策、资本账户政策存在重大争议，中国资本市场遇到了进一步深化的挑战，中国正在试行跨境交易人民币结算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深化金融改革深水区的诸多问题，如利率自由化、监管边界、银行等金融机构改革深化，有待探讨。



针对日本失去的十年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时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的经济与金融系教授费方域在《失去的十年对中国的启示》中称，日本的萧条很可能与其金融和宏观政策并无干系，而是生产率，经济结构，领导人频繁更替等因素所导致的。

同时，费教授也指出，经济学家要如何把新近的危机理论与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相结合，是经济学界一大新的理论挑战。



中国社科院结构金融研究室主任殷剑锋在《人民币国际化认识》就人民币国际化以及金融中心的建设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他指出，金融改革需要渐进式与激进式改革并行，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贸易手段和金融手段并举，其中更重要的是金融手段。金融中心的建设要让上海和香港并举，上海立足在岸，香港立足离岸。

PartVI：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机制

在中国改革的进程中，经济成果的利益分配越来越凸显其重要性。其中，住房、医疗卫生、教育等社会政策的公平有着重要的地位。同时，财税政策在保障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地位、面临的挑战及展望。这些问题都指向了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社会政策改革方向。



房产税业已成为了热门的公共话题。然而，房产税的讨论和政策制定在中国却没有做到真正的公共决策，而是一小部分决策层决定的。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陈杰副教授在会上呼吁，房产税的推出要有更多更广泛的讨论空间，而不能为了政治目的而仓促推出。对房产税的把握要有更多对其基本原理的探讨，比如它是否真能起到抑制房价的作用。而像重庆即将推出的房产税政策更是应付性的对房屋消费的调节，如果不能达到预期效果，之后再调整将对政策有效性产生重大影响。



复旦大学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研究所所长李维森把中国经济的发展形势概括为市场化进程的畸形化。这主要体现在货币化不断加速，证券化在萎缩，政府行政控制化不断加强。

李教授另外指出，中国经济和体制都是连在一块的，而体制改革必要先进行财政改革，并普及有限政府的理念。

PartVII：制度转型、社会危机与公共治理

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经济发展单靠经济已走到尽头，需要一些经济背后的东西。经济发展需要法制政府，需要公民社会，需要其他各种各样的维系经济发展的一些更加广阔的内容。这涉及到一个制度转型，社会资本与公共治理，政府绩效与公共治理能力，社会转型与政府治理模式转变，行政体系转型。



湖南大学法学院院长杜钢建教授在《儒家思想与中国宪政》中，回顾了中国古代的宪政思想，指出中国古人是高度注重对政府权利的制约的，而我们却面临着对这种传统思想的断代思考。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中，有对宪法的遗忘和漠视。然而，今后 30 年中国的重大政治改革，如大部门改革、行政三分制，审议制的改革都要和宪法的话题配套进行，才有可能发挥效益。



在三位嘉宾都谈到权力因素造成的林林总总的中国社会问题之后，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毛寿龙教授却在思考着一个规范性的理论问题，即：一个没有权力的政治和社会模式在中国是否可能。

他认为，政府职能的转变在中国实际上是越来越难，从中国历史看来，尽管制度的转变可能非常迅速，但政治的核心运作资源还是一些非常封闭衰败的理念。因此改革最重要的是从理念上把自由和权利的基础理念融入进我们的体制当中去，并和现实紧密结合起来。

PartVIII：关注当下：我们面临的挑战

研讨会最后的晚宴中，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吴晓灵女士与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先生发表演讲，对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做了分析。



彭文生在《控制通胀的成本又多高》中辨析了通胀的性质，他认为，本次通胀主要是需求拉动的周期性现象，指出货币投放对通胀的传导机制主要体现在刺激消费需求之上。

另外一个传导机制就是对通胀预期的影响也造成了物价的轮番上涨。同时，基于人口结构在物价变化中的决定性因素以及国际比较，他认为中国目前的通胀率依然维持在合理通胀率的水平。

彭文生在最后指出，相对通胀，房地产泡沫带来的风险更应为我们关注，其带来的庞大的财富转移和对新一代中国年轻人的创新能力的损害，足为我们警惕。并且无论如何，调控不应是周期性的调控，而应该是长期的对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

研讨论道

SIFL • 论道（第八期）之

——“汇率对国际间经济调节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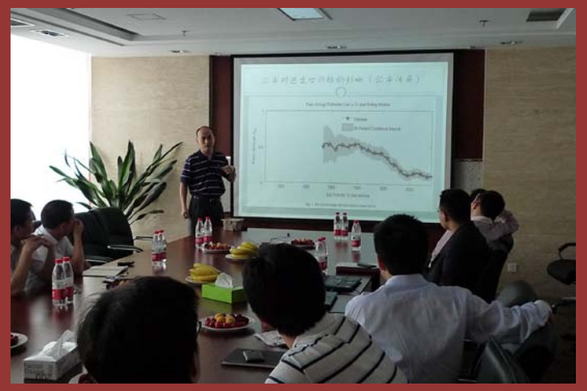
在“二次汇改”周岁之际，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屡创新高；但与此同时，中国的贸易顺差仍在不断累积，严重影响了中国国内政策，也被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诟病不已。

在此背景下，“SIFL • 论道（第八期）”——“汇率对国际间经济调节的作用”应景召开。本期主讲嘉宾是来自美国达拉斯储备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王健博士。

对于汇率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王健博士明确指出，汇率的波动性远远大于其余的宏观经济变量，汇率对贸易平衡的影响非常弱。

在中国是否应采取浮动汇率的问题上，从自身利益来看，循序渐进地采取浮动汇率利大于弊，主要体现在能够提高中国金融市场的效率以及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参与本次论坛的投资公司及媒体人士还对强势美元的条件、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的流程、美元未来走势等多方面与王健博士进行有益交流。





SIFL • 论道（第九期）之

——“公共建设项目投融资模式”

2011 年 12 月 15 日，由美国明尼苏达州大学教授赵志荣先生主讲的“SIFL •论道（第九期）”——“公共建设项目投融资模式”在研究院举行。

当前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公用事业需要大量资金支持，而中央及地方在铁路、公路、保障房、廉租房、电力、电网等公用设施建设中存在很大缺口，甚至大量公路、铁路建设完工情况差，很多项目出现停工。在不断加速的城市发展中，如何合理解决建设资金短缺，的确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赵志荣教授目前正参与研究美国 Georgia 州地方政府的融资，并已收集所有共 800 多个县市过去 30 年的融资数据，用以分析州与地方两级的融资约束、融资负担及融资管理，并打算用数量模型分析各地方政府的融资机制，对国内的相关领域探讨具有一定的帮助。

SIFL·研讨（第二十六期）之

——“未来轨道规划及发展”高峰论坛

“十二 • 五”期间，国家强调要把城市轨道交通作为城市基础建设领域的投资重点，进一步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为中国轨道交通市场带来新一轮机遇。如何紧跟国家政策的发展动向，第一时间了解各城市轨道交通项目规划需求、掌握轨道交通技术的研究方向，是各轨交设备供应商及相关技术产业公司的当务之急。

在此背景下，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聚焦上海、北京、南京、宁波等城市轨交项目，策划并主办“SIFL • 研讨（第二十六期）”——“未来轨道规划及发展”高峰论坛，旨在聆听政府高层对轨交未来的规划与展望，分享相关经验、寻找合作伙伴、共同发现机遇。

本次论坛的嘉宾来自国家与地方政府的主管部门、各级轨交建设单位及设计院、轨交相关支持部门等，并吸引数百名轨交相关产业的企业负责人与会共谋发展。

SIFL·研讨（第二十七、二十八期）之

——“地方投融资平台与城市发展”沙龙（第二、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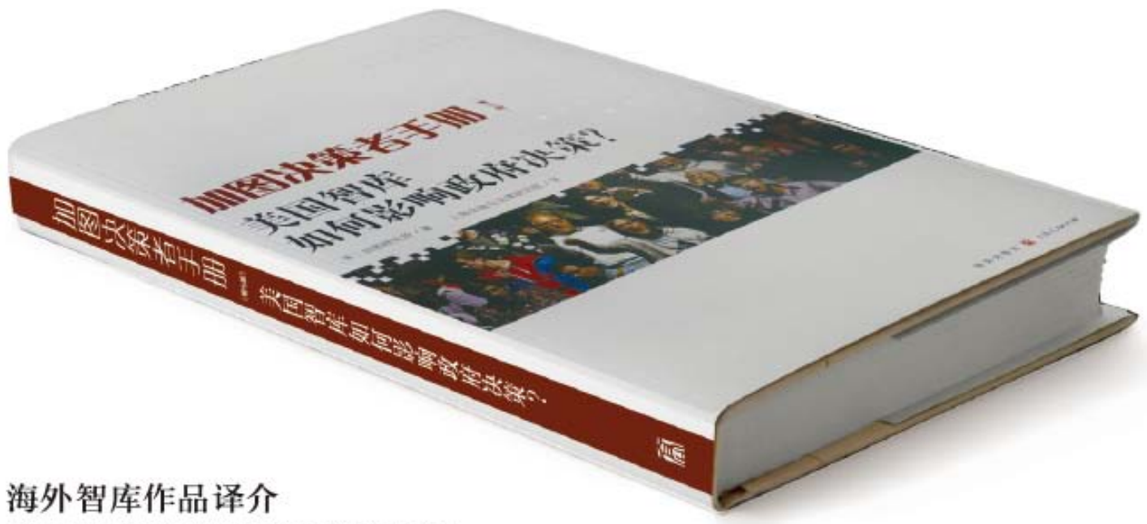
城市的发展，尤其是城市化进程离不开基础设施的投资、融资活动。如何制定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以保证城建投融资的健康发展正成为地方政府及城投公司所关心的问题。基于这样的背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联合上海济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共同开展“地方投融资平台与城市发展”系列沙龙。本系列沙龙定位为公益性活动，活动主题围绕“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公共政策与投融资”等方面，以圆桌会议形式举行，包括主旨演讲、嘉宾评议和自由讨论等环节。2011 年，该沙龙共举办两期。

在沙龙活动第三期，研究院特邀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汉弗莱公共事务学院的助理教授赵志荣和上海市财政局国库处处长莘澍钧分别从理论与具体操作两个层面进行主旨演讲。赵志荣教授在以“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融资：美国经验与中国讨论”为题的发言中，与大家分享了他在美国调研获得的美国地方政府税收和预算数据、美国基础设施投融资的传统模式以及美国基础设施投融资的新近议题，引发了在场嘉宾们对中美两个世界级经济体在投融资领域作为的探讨。

《加图决策者手册》

Cato Institute（加图研究所）成立于 1977 年，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智库之一。据 2010 年最新全球智库报告，加图研究所全美排名第八。加图研究所以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为思想根基，致力于“扩展公共政策研究和讨论”，其政策分析曾影响过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决策。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加图决策者手册》由 Cato Institute（加图研究所）独家授权，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翻译并引入中国。这本册子是加图出版物中极为经典的、触及公共政策领域细节问题的好书，已经引入，就在国内图书和学术界引起不小反响。



海外智库作品译介

Overseas think-tank translation works

《加图决策者手册》上海读书会





零点咨询集团（上海）公共政策研究院副主任**周雷**

讲述他在非洲考察期间，用人类学角度解读公共政策



上海格致出版社同仁

与我们共同主办了这次上海读书会

如何将触角过长的美国政府关进笼子里？

加图研究所的专家为当下所有重要的美国政策议题提出了建议，包括削减财政开支、医疗体系改革、外交政策、社会保障、教育、税收及能源政策等。围绕这些不同方面的问题，本书基于事实而让人折服的分析将引导读者深入美国的社会肌理和思想传统，了解美国政府面临的挑战以及美国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关于如何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捍卫美国人民的自由，本书在美国的政治心脏——华盛顿被视为标准制定者。《华盛顿邮报》称此书为“关于如何削减政府开支、取消无谓事项、关闭冗余机构、大幅度限制联邦政府权力的一应俱全的备忘录”。对政府决策者来说，本书提出的政策建议极富参考价值；对任何希望了解美国社会，了解如何通过有限政府来获致自由的普通读者，本书同样值得一读。



加图研究所 (Cato Institute) 位于华盛顿特区，成立于1977年，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智库之一。根据2010年最新的全球智库报告，加图研究所全美排名第八。加图研究所以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为思想根基，致力于“扩展公共政策研究和讨论，旨在“恢复小政府、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和平的美国传统”，其政策分析曾经影响过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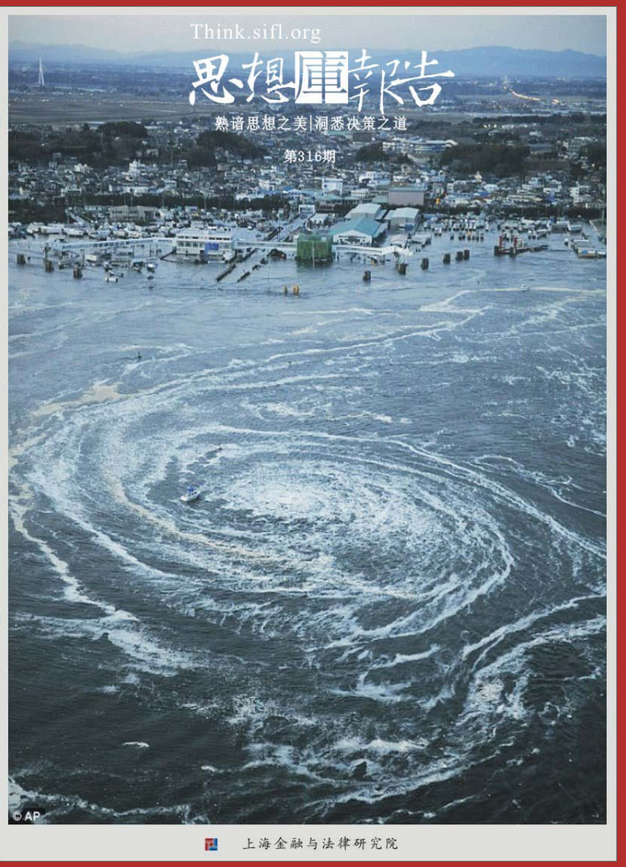
刊物

《思想库报告》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出品的一份公益性电子刊物，
以国际智库之思想，关照中国改革之现实。

订阅请发信至：sifloffice@gmail.com

新闻组论坛为 :http://groups.google.com/group/ThinkTanksRepor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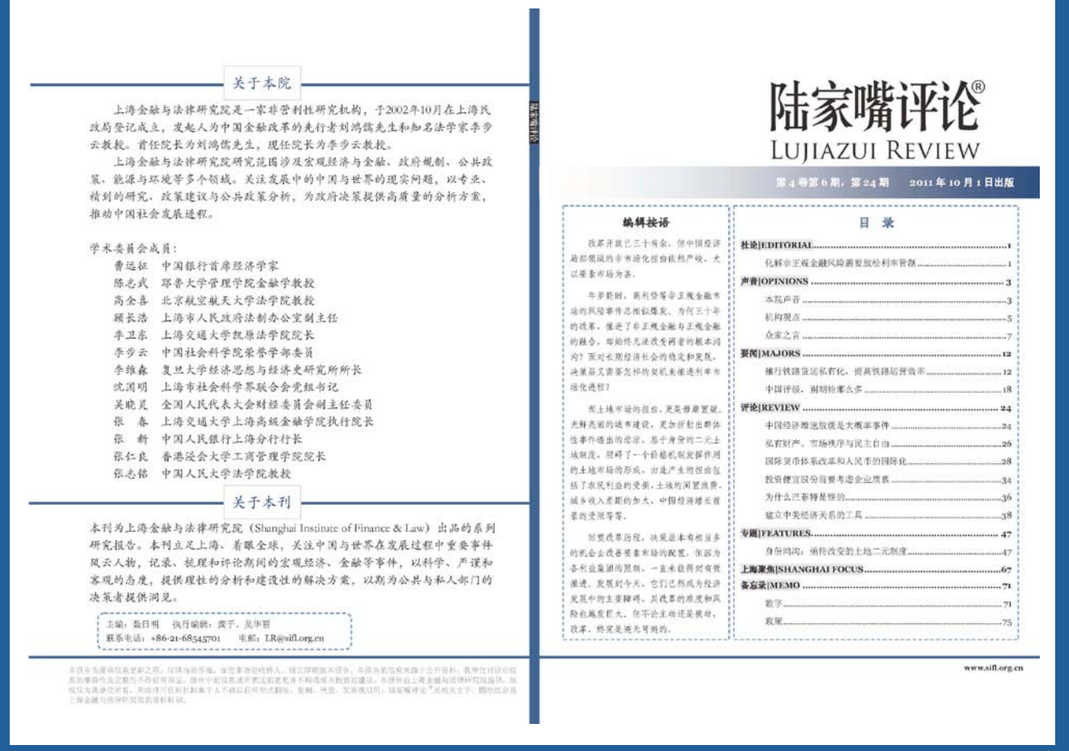
Think.sifl.org
思想庫報告
熟谙思想之美|洞悉决策之道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







关于本院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是一家非营利性研究机构，于2002年10月在上海民政局登记成立，发起人为中国金融改革的先行者刘鸿儒先生和知名法学家李步云教授。首任院长为刘鸿儒先生，现任院长为李步云教授。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范围涉及宏观经济与金融、政府规制、公共政策、能源与环境等多个领域。关注发展中的中国与世界的现实问题，以专业、精到的研究、政策建议与公共政策分析，为政府决策提供高质量的分析方案，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

学术委员会成员：

曹远征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陈志武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
高全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
顾长浩　上海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副主任
李卫东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
李步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李维森　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
沈国明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
吴晓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张　春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院长
张　军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
张仁良　香港浸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张志铭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关于本刊

本刊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Shanghai Institute of Finance & Law）出品的系列研究报告。本刊立足上海，着眼全球，关注中国与世界在发展过程中重要事件风云人物，记录、梳理和评论期间的宏观经济、金融等事件，以科学、严谨和客观的态度，提供理性的分析和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以期为公共与私人部门的决策者提供洞见。

主编：张日明　执行编辑：黄子、吴华君
联系电话：+86-21-68545701　电邮：LR@sifl.org.cn

陆家嘴评论®
LUJIAZUI REVIEW

第4卷第6期，第24期　2011年10月1日出版

编辑按语

改革开放已三十有余，但中国经济局部领域的非市场化现象依然严峻，尤以要素市场为甚。

年岁渐长，新利资等非正规金融市场的风险事件总相似爆发。为何三十年的改革，催进了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的融合，却始终无法改变两者的根本问题？面对长期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决策层又需要怎样的契机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

离土地市场的扭曲，更是难避复现。无疑类似的城市建设，更加容易出现外生事件诱发的症结，基于身份的二元土地制度，塑造了一个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土地市场的形成，由此产生的扭曲包括了农民利益的受损，土地的闲置浪费，城乡收入差距的加大，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受限等等。

回望改革历程，就是基本有组织多的机会去改善要素市场的配置，促进为多利益集团的预期，一直未获得对有效推进、发展到今天，它们已然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障碍，其改革的难度和风险也越发扩大，但不论主动还是被动，改革，终究是迫无可避的。

目　录

社论|EDITORIAL 1
化解非正规金融风险需要放松利率管制 1
声音|OPINIONS 3
本院声音 3
机构观点 5
众家之言 7
要闻|MAJORS 12
推行铁路货运私营化，提高铁路运营效率 12
中国评级，刚刚特哪么多 18
评论|REVIEW 24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大概率事件 24
私有财产、市场秩序与民主自由 26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人民币的国际化 28
投资建议及份有要考虑企业质素 34
为什么巴菲特是慈善 36
建立中美经济关系的工具 38
专题|FEATURES 47
身份同沟：承担改变的土地二元制度 47
上海聚焦|SHANGHAI FOCUS 67
备忘录|MEMO 71
数字 71
政策 75

www.sifl.org.cn

《陆家嘴评论》

本刊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SIFL Institute）出品的系列研究报告。

本刊立足上海，着眼全球，关注中国与世界在发展过程中重要事件风云人物，记录、梳理和评论期间的宏观经济、金融等事件，以科学、严谨和客观的态度，提供理性的分析和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以期为公共与私人部门的决策者提供洞见。

发表

智库观点的传播，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甚至比研究本身更为重要。

为赢得思想市场、影响公共决策，研究院深知在公共传播领域必须有所作为、通下达上；因此，我院研究员持续在公众媒体上的活跃度，与《东方早报》、《新闻晨报》、《时代周刊》、《南方都市报》、《环球时报（英文版）》、《每日经济新闻》、FT 中文网、《中国证券报》、《21 世纪经济报道》、《新民周刊》、《财经》、《城市中国》、网易评论、搜狐财经等国内主流财经类媒体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借助他们的平台优势发布我们的研究员文章，并担任特约评论员；文章内容涉及宏观经济与金融、医疗卫生、公共及高等教育、社会保障、住房政策、产权保护、能源环境等多个方面，主动让思想走得更远。

执行院长傅蔚冈博士发表文章：《Loosened milk standards don't mean bigger risks》

刊于 2011 年 7 月 1 号《Global Times》



26 Friday July 1, 2011

BUSINESSCOMMENT

Commentary

Mosa

Loosened milk standards don't mean bigger risks

Rare e

Baotou Steel (BSRG), one earth produc agreement w Nonferrous bid to streng their respect South China On the da

Hous

Despite a ser targeting the market, hous stable, while ers have give attitude and according to Information

Airbu

Airbus signe day with its increase the ders at the H Composite M (HMC), a Jo Airbus and A

By Fu Weigang

Wang Dingmian, chairman of the Guangzhou Dairy Association, said at a recent industry meeting that the country's current standards for fresh milk, which took effect on June 1 last year, are the loosest in the world, and called them "a national shame."

His comments were prompted by the fact that the indices in the current standards a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previous standards, which were implemented in the 1980s.

However, it is wrong to think that the lowered standards will necessarily result in poorer quality milk. If anything, they will help to maintain a sufficient supply of dairy products while protecting milk farmers' interests.

The current standard for milk bacteria content is 500,000 per milliliter. This differs to the previous standards, under which there were four grades, varying from 500,000 per milliliter to 4 million per milliliter.

The minimum protein content level has been lowered from 2.95 grams per 100 grams of milk to 2.80 grams.

ucts has grown over the last 10 years, small dairy farmers have come to play a dominant role in the sector, accounting for 76 percent of all dairy suppliers.

This is a turnaround from the 1980s, when State-run dairy plants were the major suppliers. These scattered, small dairy farmers with lower-quality feeding conditions for their cattle struggled to meet the previous standards, with many falling short and having to discard large volumes of substandard milk.

The old standards also pushed up costs for dairy suppliers and firms, and therefore the public. They also gave an incentive to dairy farmers to use additives to help their milk meet the criteria, resulting in the melamine scandal.

The newer standards, although lower on paper, will actually help support the industry. The dairy firms will do all they can to ensure safety is as high as possible to avoid a repeat of the melamine scandal, especially with the public and media becoming ever more vigilant about food safety.

I would suggest, however, that in order to allay fears over the lowering of the standards, to grade milk depending



A06 特别报道 SPECIAL REPORT

直面“中等收入陷阱”

2011 年 1 月，研究院系列年会——“SIFL 年会（第五期）：中国下一站，机遇与选择”在上海举行。

本届年会聚焦金融危机下的中国、居民收入、消费需求、住房问题、社会保障、医疗设施等关乎百姓的切实话题，并邀请来自“一行三会”等部门的政府高级官员、中国高校研究精英、企业界翘楚、财经类资深记者以及海内外共同关注中国未来走向的学者，在业界学界都引起关注。

图为《时代周报》对本次年会进行的专题报道及人物专访，除此之外，本次年会还受到了上海第一财经、FT 中文网、《经济观察报》、《21 世纪经济周刊》等媒体的关注和报道。



嘉宾访谈

经济向好关键是还富于民

受访者

《时代周报》第 113 期（2011 年 1 月 17 日出版）A06“特别报道”版

整版刊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 2011 年“中国下一站：机遇与选择”年会专题报道

媒体发表

在媒体发表的文章选题方面，我们力求贴近生活，将宏观经济、法律规范等大话题、大观点浓缩在民生的小事件、小人物中，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建议，时刻发挥自己作为智库的思想力量。以执行院长傅蔚冈博士的文章为例，在全年发表的近百篇文章中，涉及到的民生话题就包括春运、食品安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人口老龄化、环境质量、户籍改革、农民工子女教育等，坚持用专业知识、站在客观立场评析时事、针砭时弊。

开篇

春运列车何时到站？

傅蔚冈

一年一度的春运又将到来。据国家发改委表示，兔年春运将从2011年1月19日开始，至2月27日结束，总计40天。由于火车票是提前10天购买，这意味着中国的铁路售票系统已经正式进入了春运阶段。而从各地的反应情况来看，今年春运的形势仍然不容乐观：目前不少地区的火车票售票处的购票长龙就是一个明证。

“春运年年有，今年特别忙”。虽说道路运输部门非常重视春运，但是运输部门运力的增长对于春运的增加而言实在是杯水车薪。据国家发改委12月29日表示，预计春运期间，全国旅客运量将达到28.53亿人次，比上年春运增长11.6%。如何消化这增长的11.6%的人口？将成为所有道路运输部门的一个难题。

因为户籍而产生的春运

为了应对一年一度的春运，各个运输部门使出浑身解数。如北京铁路局规定，自1月5日开始，同一单位购买同一日期、同一方向500张以上车票的，可以向铁路部门申请办理农民工专列；而交通运输部则专门发布《春运农民工平安双返服务竞赛通知》，要求开展“以服务广大旅客特别是广大农民工返乡（离）安全便捷出行为主要内容的岗位练兵和服务竞赛”专题活动。但问题是，每年的春运问题是运输部门提高运力就能解决的问题吗？

显然不是！那么是铁路的运力出现问题吗？这个理由听起来很有道理，甚至是铁道部每年大干快上搞建设的理由。但是如果仔细深究，这个理由也是很勉强。虽然中国的铁路网密度相对较低，每万人仅拥有铁路0.57公里，人均不足一支烟的长度，在世界上排100名以后；每万平方公里国土拥有铁路78公里，在世界上排60名以后。但是这个里程的铁路在应付闲暇时间时却是绰绰有余的，甚至在国庆长假和其他节假日里也没有手忙脚乱，为什么平时运输企业可以完成运输任务，而单单春节期间无力应付？由此可见，铁路运力的不足并不是春运运送旅客难的理由。如果铁路建设大干快上，估计中国铁路在非春运期间将会出现大范围内空无一人的车厢。



春运其实是在翻越城乡之间的大山。　　本报记者　郭杨　摄

也有学者认为是因为价格机制不到位所致。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在多年前就曾经指出，春运之所以会成为问题是因为铁道部始于2007年的对全体乘客春运不涨价承诺。基本理由如下，由于价格太低，导致外出的人太多，但问题是，价格机制在春运问题上并不会产生作用：因为对于绝大多数的外来务工者而言，春节是其一年一度回家与亲人团聚的机会，春节一定要回家，除非天塌下来。以价格上涨这一机制来调节客流，显然是开错了药方——因为在2007年以前春运期间的人流并不因为价格上涨而减少。

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在我看来，与其说是技术上的原因导致春运运力紧张，不如说是中国户籍制度而产生的城乡分割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劳动力一体化之间的矛盾所致。从历史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也存在着在春节期间的人口大转移，只不过那个时候的流动方向和现在相反：春节前，人流大量自西向东流动，而春节后的人流则是自东往西。该种现象之所以发生是因为1949年以后的中国工业内迁，很多原本家在东部的工人也随之迁向西部。不过在计划经济时代，人流并不很大，交通运输部门也都能有条不紊地应付——因为作为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还被户籍制度束缚在土地上，无法进城务工。

1980年以后，尤其是90年代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情况完全不同了。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只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不准许人口自由迁徙”。由此导致了每年数十亿人口全国范围内的流动，导致了每年春运火车站内万头攒动的“盛景”。春运表面上是和一年一度要回家过年的习俗有关，但根源恐怕是外来务工人员由于不能够取得所在地的户籍，不能够将家人接到他所在的城市一起生活而不得不在工作地和户籍地来回奔波所致。

如果是要减缓春运中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势必要对当下的户籍制度作根本的改进。户籍制度原本就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其目的是为了限制农村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动。而今市场经济是要求人财物在市场的基础上自由流动，但是户籍这一制度却阻碍了人口的有序流动，导致了每年一度的蔚为壮观的全球罕见的人口流动潮。如果当下中国取消了户籍等限制外来务工人员在本地落户的制度，还会出现春运这一问题吗？我们还会畏惧雨雪天气对春运时期的威胁吗？因此，有没有勇气让外来务工人员在本地安家落户、融入当地的生活，就成为解决春运问题的核心。

一个节日，两种状态

与那些每到年关就计算着该如何购买一张返乡车票的农民工不同，对于很多城市居民而言，春节已经不再只是一个探亲访友的季节，更是一个外出度假休闲的好时光。而且旅游目的地不仅仅局限在国内，国外也不再只是周边的新马泰，中国人春节外出的目的地已经遍及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为什么城市居民会在春节期间选择外出？他们拥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自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但更为重要的是，对于绝大多数的城市居民来说，他们是当下的户籍制度的受益者：他们可以平日和家人在一起生活，平日即可探亲访友，无须固定在春节期间随滚滚人流去探亲。春节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合家欢聚的意义逐渐减淡，度假休闲的意义在逐年上升。

一个可以作为佐证的数据是，2000年春节期间的旅游人数只有2000万人，旅游收入为163亿元人民币。而在2003年春节的旅游人数就达到6329万人，相关收入达289.6亿元人民币。在2010年春节黄金周全国接待游客1.27亿人次，同比增长17%；实现旅游收入接近600亿元，同比增长18%左右。在这一个多亿的人口中，有多少是农民工？

由此可见，同样的一个春节，因为户籍制度因素，春运对于不同阶层的人群而言，已经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这让我们想起了一个2010年流行的段子：当你在享用苹果4代时，我们正在购买四袋苹果。同样一个节日，在不同阶层的眼中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意蕴：当城市居民在各地休闲度假时，农民工正在返乡的路上而奔波。

对于农民工而言，一周双休是个奢望，平日的各种节假日也难得清闲，只能在工厂和工地上上班；每到年关时节还要为能否顺利讨回薪资而犯愁。春节成为其唯一的休息和探亲的假期。当诸多学者和政府官员在大论特论“农民工应该避开春运返乡高峰”的论调甚至要以经济杠杆来调节人流时，这是不是太过于理性——甚至绝情了？倒让我想起“何不食肉糜”的笑话。农民工在为中国的城市化贡献众多的高楼大厦，在为城市居民提供诸多的服务功能之后，我们怎么能够忍心剥夺其一年一度回家与众亲友团聚的机会？

户籍制度改革虽然呼声颇高，同时春运期间诸多技术细节的改变正越来越不利于那些社会底层的农民工。随着高铁的高歌猛进，铁路运行图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动车和高铁，那些价格便宜的普通列车车次在逐渐减少，当铁道部官员宣称更快的速度可以运送更多的旅客时，沪蓉列车上的软卧车厢却出现了上座率不足两成的新闻。由此可见，更快的速度，却没有能够带走更多的旅客；相反，却可能将更多的旅客推向那些原本就已经拥挤的普通车次。原意在解决乘车难问题的措施，却会制造出更多的运输难题。

一个节日，两种生活状态。如果户籍制度没有得以改进——无法让农民工进城落户，而交通运输部门也无法在技术层面上以运送更多的旅客为已任，那么因为春节而产生的全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将会是横亘在城乡之间的一座大山。对于山那边的城里人来说，他们既可享受农民工低廉的服务价格，又无须忍受外出旅游的拥挤交通。而对于山这边的农民工而言，春节虽然是与家人团聚的温馨时光，但是在路上的拥堵和所受的种种不堪，成为其每年挥之不去的梦魇。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

FT中文网

我院研究员聂日明、傅蔚冈、李华芳等人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政府经济决策权应重新厘定》
《织里事件的遗产》
《化解非正规金融风险需放松利率管制》
《“再危机”阴影下的宏观调控》
《税政危机的冰山一角》
《解决地方融资困境需要长效机制》
《宏观调控绝不是微观控制》
《房产税：勿以调控之名加税》
《2011：中国民间公益元年》
《警惕技术迷信》
《中国铁路的出路在政企分开》
《“真维斯楼”背后的捐赠逻辑》
《火车票实名制试点的谬误》
《沪蓉线列车为何空闲》
《“限购”调控过犹不及》
《“进城”五则》
《“上海模式”的终结》
《中国特色还是中国模式？》
《用运动改变一切》
《中国改革是怎样失去共识的》

执行院长傅蔚冈博士发表文章：
《春运列车何时到站？》

刊于《时代周报》第 113 期
（2011 年 1 月 17 日出版）A09“评论”版

财务报告

资产负债表

	年初数	期末数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716576.34	799862.68	流动负债	224137.05	582580.63
固定资产	60742.47	85137.61	长期负债	0.00	0.00
无形资产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0.00	0.00	**负债总计：**	**224137.05**	**582580.63**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553181.76	302419.66
资产总计：	**777318.81**	**885000.29**	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净资产总计：	**553181.76**	**302419.66**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777318.81**	**885000.29**

业务活动表

项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入：			
捐赠收入	924.96	0.00	924.96
会费收入	0.00	0.00	0.00
提供服务收入	3455113.19	0.00	3455113.19
政府购买服务收入	0.00	0.00	0.00
商品销售收入	0.00	0.00	0.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其他收入	0.00	0.00	2948
收入总计：	**3456038.15**	**0.00**	**3456028.15**
（二）费用：			
业务活动成本	2320857.77	0.00	2320857.77
管理费用	1187553.41	0.00	1187553.41
筹资费用	0.00	0.00	0.00
其他费用	198389.07	0.00	3706800.25
费用总计：	**3706800.25**	**0.00**	**3706800.25**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 （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250762.10	0.00	-250762.10

现金流量表

项目		金额
（一）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		889.60
收取会费收到的现金		0.00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2922313.19
销售产品收到的现金		0.00
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		0.00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882940.56
	现金流入小计	**4806143.55**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0.00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591282.80
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支付的现金		1750388.38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2607215.43
	现金流出小计	**4948886.61**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2743.2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0.0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0.00
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0.00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0.00
	现金流入小计	**0.00**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39749.00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7600.00
	现金流出小计	**47349.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347.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0.0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0.00
	现金流入小计	**0.00**
偿还债款所支付的现金		0.00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0.00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0.00
	现金流出小计	**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0.0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90092.26**

资助我们：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上海联洋支行

开户单位：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

账号：033173-0004-0006-787

（资助者将获得 SIFL 当年所有研究成果并参与 SIFL 主办的活动）

SIFL INSTITUTE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

地址（Add）：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1199 弄证大五道口广场 1 号楼 1902 室
1902, Building 1, No. 1199 Minsheng Road, Pudong, Shanghai, China

邮编（Zip）：200135

电话（Tel）：（+86）021-68545701

传真（Fax）：（+86）021-68542335

邮箱（E-Mail）：office@sifl.org.cn

官网（Web）：http://www.sifl.org.cn

微博（Weibo）：http://weibo.com/sifl